

## 闽南文化研究国际笔谈会论点选载

编者按：2013年12月21日，由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主办的“2013 闽南文化研究国际笔谈会”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及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着闽南文化的内涵、外延及特征，闽南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社会功能，闽南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闽南文化的跨文化阐释，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及其意义，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闽南文化的生态保护，闽南文化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言简意赅，探幽发微，对当下闽南文化理论研究势必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期节录专家们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也希望由此来带动和促进闽南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升华。

### 刘登翰：闽南文化的结构关系研究

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历史是实证的，文化是建构的，当然这个建构也必须要有实证作为基础或背景。这是就方法而言。不过，西方新历史主义认为，所谓“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所有历史都是历史研究者眼中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一种建构。中国历史以帝王为中心，从三皇五帝开始，秦汉晋唐，宋元明清，一路数下来。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就是一种建构。历史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

深化闽南文化研究，我觉得有必要加强对闽南文化的结构关系研究，寻找闽南文化的内在逻辑和文化精神，处理闽南文化结构中环环相扣的各种关系。这个题目太大，无法说全；即使说到的，也只能点题，无法展开。

#### 一、文化的历史性和当代性问题

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文化的历史性无可质疑。但文化不会停止在历史的某个点上，文化总是伴随历史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这样的文化才是活态的文化，与时代同行的文化，和社会共同建构的文化。不能把文化的历史性和当代性割裂开来。历史是当代的昨天，当代是历史的今天。我们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文化的历史层面，无论文献无论田野，讲说的都是文化的昨天，而相对忽略对文化的当下存在状态和发展状况的研究，也即文化的当代性问题，这本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心。其一是文化伴随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和科技进步所出现的异变和创新，使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精神仪式，带来文化新的现代形态。这也要像历史研究做文献和田野那样，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总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二是历史文化如何经过现代转换，成为宝贵的文化资产，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包括我们以现代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例如以对土地（自然）的感恩与敬畏来诠释福德正神的信仰，用悲悯情怀和以德报怨的精神来诠释普度的民俗，使这些传统的信仰习俗重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焕发光芒。

#### 二、雅文化和俗文化问题

文化的雅俗之分，并无本质上的高低优劣之别。所谓俗文化是指以俗民（庶民）为主要载体和对象，建立在他们生活传统、信仰传统、社区组织传统和经验传统之上的，比较朴素、粗糙，因而带有一定自发性、原生性、非理性和传承性的那一部分文化现象。这是一种带有很大民间性的常俗文化。而所谓雅文化，一般是以士人（士和士大夫，即今日所说的知识精英）为主要载体和

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对前人实践和经验(包括俗民实践和经验)进行整理概括,扬弃提升,从而成为系统比较完整、逻辑比较严密、比较富于理性色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知识谱系。它常常由文化的表层进入文化的深层,从社会的底层进入社会的上层,成为统治阶级用来制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因此,相对于俗文化的下层性和民间性,雅文化带有浓厚的上层色彩和官方色彩。二者既互相依存和渗透,又互相对立和排斥。一方面,雅文化是对俗民实践和经验的综合概括、扬弃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士人文化源之于俗民文化;另一方面,雅文化作为上层的意识形态,又对俗民文化起着制约、规范和改造的作用,使俗民文化不致超越一定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道德规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幅员广大的各个不同区域中,士人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整合统一的文化共性,而俗民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出独特地域的文化个性。二者所形成的正是文化结构中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闽南文化当然应当包括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方面。雅文化主要来自于对中原儒学道统的传承和发展,即使如朱熹、李贽、苏颂那样的大家,也无不如此。而俗文化是与生俱来与闽南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文化形态和仪式。闽南文化的地域色彩和文化魅力,主要靠俗文化来体现。这也是我们谈及闽南文化,便离不开方言、宗族、民间信仰和戏曲、歌舞等的原因。但是在讨论闽南俗文化时却不应忘却雅文化的存在及其对俗文化的影响,以及两者互相渗透和制约的复杂关系。

### 三、文象和文脉的问题

这是温家宝在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时提出的概念。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起来。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又说:“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绝唱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个观念深化了我们对闽南文化的认识。我们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文象,是一个个具体的文化项目,是文化项目的表层现象。文象的研究,是为了文脉的传承。如何深入文象的表层,揭示文象的内在精神,使作为民族灵魂的文脉得以更好的传承、弘扬。这是我们研究文化的目的。闽南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样面临如何透过文象研究弘扬文脉——文化精神的问题。

### 四、文化事象的互相关联和依存问题

文化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什么是文化,我们看不见,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文化事象。一讲闽南文化,我们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闽南话,南音、梨园戏、歌仔戏,寺庙的拜拜,过年的风俗,等等。所有这些被视为文化的事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互相连结、互相依存,形成一条条文化链,一条条文化链结成一个庞大的文化网,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复杂的文化网络之中。举一个浅显的例子,闽南人或许因其迁徙途中危艰丛生,或许因其山海环境瘴疠海难不断,民间的泛神信仰十分繁复,一块石头可以是神,一个树桩也可以是神。寺庙是表达民众信仰最神圣的中心,邻近几个村子有相同的信仰,便以最有灵性、同时也是建筑最为华贵的寺庙为中心,形成一个共同的祭祀圈;人们在寺庙周围设墟赶集,周围乡村都来这里进行交易,这个共同祭祀圈同时也成为共同的经济圈;而寺庙聚集人气,是人际交流的中心;村中长辈或权势者借寺庙议论、决定、发布大事,寺庙又实际上成为村中的政治中心。文化、经济、政治就这样围绕一座寺庙联结在一起。这是大致的情况,虽为古早的事情,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各种文化事象也存在着互相联结和依存的逻辑关系。仍以寺庙为例,这是民众的信仰中心。一座寺庙的建筑,发展了特殊的建筑行业;寺庙的华贵装饰,推动像剪瓷、漆雕这样特殊装饰工艺;佛像的塑造,也发展了木雕、石雕、铜雕、泥

塑等特种工艺;而无时不在的祭祀,丰富了民众对各个民间主神祭拜的精神仪式;为了娱乐神明也娱乐自己,请戏谢神成为民间戏曲和民间表演团体生存的土壤之一。以寺庙和信仰为中心形成的文化链,使不同的文化事象互为环境,伤一环而损全身。文革期间的破四旧、禁祭祀,而使相关文化事象和文化产业濒临绝境,就是深刻的教训。文化事象虽是个别的,只有联结一起才是文化。从个别到整体,其相互关连的逻辑关系,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心之一。

#### 五、闽南文化的移民性、本土性和世界性问题

闽南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这是历史决定的。自晋以降,逮至南宋,八百年间中原移民陆续南徙入闽而至闽南,中原文化也随之南播,成为闽南社会建构的主体和基础。闽南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下位文化,或者说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区域性的文化,这个定位十分清楚。但是南宋以后福建人口已趋饱和,再少见有北方大规模移民入闽的记载,并且开始向外输出口口。南宋以后迄今又近八百年,中原文化在进入闽南滨海的地理环境和吸收闽越土著海洋文化元素中,发展了兼具海洋特色的闽南文化的特殊性格和风韵。因此我们说,闽南文化是一种既渊源于中原同时又发展于本土的草根文化。闽南文化的移民性和本土性(草根性),是我们认识闽南文化的两面。中原移民定居闽南以后出现的二度迁徙,首指台湾而后又远逸海外,把具有闽南特色的中原文化再次播向台湾,播向闽南人(包括定居台湾的闽南人)足迹所到的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因此我们说,闽南文化同时带有某些民系文化的特质,它越出闽南的地域囿限,成为一种更广泛的世界存在。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有一个“度”,不能无限扩大。首先不能因为闽南文化有着与中原文化不尽相同的海洋文化的某些特性,就否定它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更不能因为它具有民系文化的某些特征,就否认它是一种地域文化。其次不能因为它伴随闽南海外移民走向世界,就认为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存在,并不等于闽南文化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就像闽南移民在各移入国家是个弱势的族群一样,闽南文化的世界存在,相对于所在国的主体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它走出了闽南地域,但并没有走出闽南人的圈子。在异国他邦,它是闽南人为保存自己族群记忆和凝结族群力量而坚守的文化,而不是世界不同民族共同的文化。闽南文化的世界存在和闽南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关注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存在,关注它在异文化环境中的坚守和异变,这些都是我们深化闽南文化研究的新课题。但闽南文化的世界性研究不能脱离它的本土背景,闽南文化的海外研究与闽南文化的本土研究,二者如何相辅相承,互相促进,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汤漳平:关于闽南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回顾自己从事闽南文化研究的数十年经历,着重思考进行闽南文化研究的方法,其中既有个人的心得,同时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或许这些方面的思考,能够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参考。

关于闽南文化研究,近些年来已经出版过不少著作、论文集,取得不小成绩,有些人就认为再难以深入,难以出新。但我认为总体宏观理论建构依然不足,理论迟滞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仍有大量值得我们认真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关于闽南文化的底层文化,一般的观点都认为,闽地原是百越族的居住地,因此百越文化是闽南文化的底层文化。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发现其实楚文化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百越文化的影响。近两年来我写的几篇文章都谈了我的观点。为什么说楚文化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更大呢?过去的研究都认为,汉武帝时期,虽然百越族被北

迁至江淮间,但总还有许多人留下来,不可能迁徙得那么彻底,有人甚至估计留下的越族应有十万甚或二十万之众。但在2007年学者李辉撰文《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文中说通过多年调查研究,“百越族群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展得非常深入,现代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已经基本厘清。”“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已经消失。”显然,汉武帝时期闽越人的北迁十分彻底。如果这个结论不错的话,那么,百越族文化就难以成为今日闽南文化的底层文化了。同时,我们过去都说闽南人族群主要是从中原迁入的,传承的主要是中原河洛文化,也即是周文化,其实也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中原入闽移民多称来自光州固始及其周边地区,这里严格说并非周文化的核心区,它在上古三代为淮夷文化区,春秋战国则长期为楚国的东楚,后期陈郢还是楚国都所在地,具有深厚的楚文化底蕴。研究表明,楚人从中原地区南迁后,承传的是殷商文化,因此闽南人信巫鬼,未必是源于越,楚文化被称为“巫官文化”是和北方的史官文化明显不同的,屈原的作品,《九歌》《离骚》《招魂》《卜居》等都有浓厚的巫文化成分,所以日本学者滕野岩友将其称为“巫系文学”。而善于用舟楫,也不是越人的专利,《楚辞·九章·涉江》全篇描述乘船从郢都历经湘江至湘西,可见楚人也是很会用舟船的,豫南信阳博物馆展出的也有从淮河边考古挖掘出的远古时期的独木舟。当然殷商文化是更早的河洛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到周代,楚人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周人礼乐文化的熏陶,但依然保持其与北方不同的特性。而闽南方言中,究竟有多少底层越语,我颇感怀疑。先秦时期越语和夏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系,越语保存下来的资料只有《越人歌》和越王勾践发布的《维甲令》,是用语音记录下来的,和华夏语毫不相通,殆同天书,有学者研究认为属于侗台语系,和汉藏语系完全不同。因此,在判断哪些闽南方言中语词是越语语词时,恐怕要特别慎重。

其次,关于研究方法应当有开拓和创新。一是应当广泛阅读各种传世文献和研究成果,详尽占有资料,打通文史哲的界限,才能视野开阔,善于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二是跳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搞人文科学的学者,也要了解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我在前面讲到的用分子人类学来了解百越族群的分布和中原移民的群体基因,就已突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在这方面我还有过教训,如1990年在漳州召开陈元光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提交了一篇文章,是关于《龙湖集》真伪问题的,我认为其中一篇写到雪景的文章不会是陈元光所作的,因为闽南天气这样暖和,怎么会下雪。后来龙岩的郭启熹先生说,龙岩当时也是陈元光开发治理的地区,气候比漳州冷,每年都有一场雪,不能据此认为此诗是其他人的作品。后我又查漳州史志时发现,历史上漳州也确有下雪的记录,“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漳浦大雪,高二尺。”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汀水先生的《明清福建的严霜大雪及对农林果畜业的危害》中统计出自明景泰三年(1452)至清宣统三年(1911)的459年间,福建凡下大雪至少213次,其中“积雪连旬或浹月不消的大雪凡23地次”。如明景泰三年泉州和漳州府的大雪,“积雪连旬,穷阴弥月”,农业大受损失,朝廷下旨减税十分之五。广东气象部门研究表明,公元六、七世纪广东地区处于历史上的气候寒冷期,珠江流域生长着温带的树木,这样看来,以今日闽南气候温和为由否定一千多年前的咏雪诗,是以今律古,这种证据是靠不住的,应进一步研究。气象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缺少这方面知识就可能在判断时发生错误。

三是应当对流传至今的古代书籍、资料认真阅读,不要轻易指为伪作。古代的书籍流传至今极少,百不存一,因此能够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其重要的价值。对疑古思潮要作分析,不能轻易盲从。许多学者知道,中日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发生过有关屈原问题的论争,日本学

者根据中国的疑古派提供的材料而论定我国历史上并无屈原其人，或者虽有其人但不是流传至今的楚辞的作者。这个教训值得吸取，上世纪为什么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与史学界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疑古思潮有关，一些学者不认真研究我国古代典籍特殊的传播方式，仅凭传世文献来证伪，使得“三代以上几无可读之书”，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因此对于正典、野史、方志、族谱等资料等，都要认真研究分析，现在还提出作口传史的整理，因此作一个结论，应当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分析研究。古人不会出来为自己辩护，在证伪时应当提倡法律上目前主张的“无罪推定”，而不是过去实行的“有罪认定”。

四是关注出土文献的资料。王国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要将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和文献资料与传世的文献相互比较进行研究，后来饶宗颐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这些年又有人提出“四重证据法”，即增加域外文献作为比较和参照。刚才新加坡学者的柯先生提到史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与口传史资料相结合，这些均无矛盾，都是我们在搞文化研究时必须重视的，例如有许多出土的历代碑刻、墓志铭等，对于闽南文化研究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笔者近见一篇文章《福建所出唐宋时期买地券考释》（鲁西奇，刊载于《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全文便全部引用自唐到元代墓葬出土的“买地券”文本，分析和研究闽地的古代民间信仰与民俗的形成等。以上想法仅供参考。

（作者系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 杨彦杰：田野调查与闽南文化研究

无论是台湾史、闽台关系史还是闽南文化研究，从主要方面来说都是在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文化。这其中虽然离不开大历史的背景，与皇朝中央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儒家学说等上层文化息息相关，但是从历史创造的主体来说，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研究视野，要研究好地方史、地方文化或某个民系文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们面对的恰恰是这方面资料的匮乏。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章史籍中，几乎都是由官方书写并积累下来的材料。二十四史不用说，官方档案也不必谈，就连最直接反映地方的各种方志，也是由官方编修的，因此它们反映的都是历代统治者的意志、理念和儒家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视角，而真正涉及普通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材料就少之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开展地方、民系历史文化的研究？除了已有的文字资料需要很好的梳理解读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做大量田野调查的工作，直接从人民群众当中、从民间社会里去收集、整理、记录史书上没有的资料。这些资料既包括各种有文字的材料，如碑刻、契约、账册、文稿、书信、谱牒、科仪等，也包括各种没有文字形态的记忆，如口头传说、民间故事、传统仪式、风俗习惯等。尤其在20世纪中叶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甚至中小城镇，普通百姓绝大部分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在这样不能普遍使用文字的社会里，历史的传承依靠什么？仪式、故事、习俗，这些已经进入百姓生活、习以为常的东西，便是传承历史最重要的媒介，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人民群众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当然，要利用好这些没有文字的历史材料，单靠历史学者擅长的文献解读法明显就不行了，这需要我们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把这些没有文字的历史记忆变成有用的研究素材。学术视野的下移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包括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是做好闽南文化研究尤其是底层文化研究最需要关注并亟待加强的一个问题。

要做好闽南文化或者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既然离不开田野调查，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加大投入，有意识地予以促进，同时还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全面调查。以往历史学者利用史料进行研究,观察的重点往往比较宏观,即我们常说的大历史。而人类学者擅长于田野工作,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村落的参与观察,其视野相对比较微观。而我们要做的是普通百姓的历史文化研究,需要做社会的、民系的整体考察,介于这两者之间。然而,在传统社会里,那些没有文字的民间传说、故事、民俗技艺等,往往随着某个知情人或传承人的去世就会跟着带走。因此,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尽快用文字记录下来,把它变成可以阅读的文本就成为当务之急。这种田野调查工作不可太杂太碎,需要有规划地做整体的科学整理,才有可能提供给当前及后来的研究者相对完整的资料体系。

第二是比较的视野。我们做田野调查,最终都会落实到对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质的归纳上。这些年来,不同民系文化的研究如火如荼,总结提炼出不少民系文化的特征,应该说是很有使命感而且是有成绩的。但是通读起来,又会发现很多归纳在不同民系之间都差不多,如不管是闽南文化还是客家文化,都会提到勤劳勇敢、开拓进取、乐善好施、尊师重教等,不能说这样的总结有什么错,而是说这样的归纳总结看不出这个民系与那个民系的文化区别在哪里。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者缺乏比较的视野。研究闽南文化最好要同时了解其他相近的文化,在研究中随时可以进行比较,以发现彼此之间真正的不同。闽南地区除了闽南人之外,还有客家人,以及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有意识地全面展开,注意各个不同民系或族群文化并进行比较,这样对于深入了解闽南民系的文化乃至开展更大范围的文化研究,应该很有好处。

(作者系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原馆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谢重光:关于闽南文化的范畴与研究方法问题

闽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族群文化。其内涵应包括闽南文化的酝酿与形成,也包括闽南文化的丰富表现及其对外传播。

从酝酿与形成的角度,应研究唐宋以前北方人向闽南的移民史、民族交流与融合史、区域开发史;

从闽南文化的丰富内涵角度,应研究闽南地区的民俗文化与雅文化;

从闽南文化对外传播的角度,应研究闽南人向台湾、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移民的动因、移民路线、历程,对台湾与东南亚的开发,闽南原乡文化对移入区域的适应与文化交融;

作为区域文化。闽南文化既包括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文化,也包括讲客家话的客家文化,还应包括这一区域内的畲族文化。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区域文化内部的差异性问题。闽南文化的各个小区文化有共同性,整个汉族甚至整个中华文化也有共同性,我们固然要总结中华文化、汉族文化以及闽南文化的共同性,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其差异性。以闽南文化内部的泉州文化与漳州文化为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漳泉二州文化异同论》,认为泉州与漳州的自然条件不同,漳州土地肥沃,是鱼米之乡、花果之乡,谋生容易;泉州舄卤地、盐碱地多,适宜种地瓜,粮食不足,谋生不易。谋生容易的漳州人养成了安土重迁、相对比较保守的区域人文性格,而谋生不易的泉州人则养成了以海为田、积极对外开拓的区域人文性格。另一方面,从泉州人与漳州人的族源也不尽相同。除了闽越土著与自北方南迁的汉人部分比较接近之外,唐宋时期有较多来自阿拉伯、波斯的海商融入泉州人中,成为泉州人的重要族源;此类海商融入漳州相对较少,却有较多的来自武陵山区信仰槃瓠的少数民族融入漳州人中,成为漳州人的重要族源。泉州人中的阿拉伯、波斯海商成分,

进一步加强了泉州人海洋文化性格,漳州人中的武陵蛮成分,则加深了漳州人的农业文明性格。上述漳泉二州区域族群文化性格的差异,是改革开放以来两地发展途径与发展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说闽南文化中具有浓厚的海洋文化因素,若细分起来,泉州文化中的海洋文化性质更强,漳州文化中的海洋文化性格就相对淡薄一些。

深入细致地研究好闽南文化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也是促进闽南文化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方面。例如三山国王信仰,过去有人把三山国王信仰说成台湾客家人独有的信仰。甚至以三山国王庙宇作为识别历史上台湾客家人分布的重要标识。但若细考三山国王信仰的形成历史,我们发现,它肇于隋唐,盛于宋,广泛传播于元明以后。隋唐时期粤东尚是俚人的天下,对此谭其骧先生早已作了详尽的论述。准此,则三山国王信仰最早应是在俚人等粤东土著中兴起的,后来入居粤东的福佬人、客家人先后接受了三山国王信仰,畚族也继承了粤东土著的三山国王信仰传统,因此,三山国王信仰是包括福佬人、客家人和畚族在内的粤东各族群共同的民间信仰。三山国王信仰从粤东传到台湾,受到台湾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共同信奉是毫不足怪的。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不但可以廓清长期困惑学界的台湾三山国王信仰是否客家人专利的问题,也足见三山国王信仰也是研究闽南文化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最后谈谈研究资料问题。要促进闽南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应重视新资料的挖掘,包括传世文献资料,民间文献资料,考古与文物资料。对于民间文献资料中的族谱,要在鉴别的基础上合理运用。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 陈 耕:重新认识闽南文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重新定位闽南文化,是闽南文化研究一项重要的工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性和世界性是不可分的。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发展焦点在东亚。闽南文化无论对东北亚还是东南亚,都有历史久远的影响,如何发挥闽南文化的软实力,在 21 世纪的世界发展竞争中争取更有利的制高点,已经不仅是闽南的问题,而应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杠杆支点之一。

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从黄土走向海洋的当代史,但是中华民族从黄土走向海洋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五代闽南的王延彬就大力发展海洋贸易,被称为“招宝侍郎”,其后的留从效修建泉州城,遍植刺桐树,在城外设泊船装卸货物的“云栈”,刺桐港从此扬名世界。到宋元时期,刺桐港已成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另一个据说是埃及的阿拉伯港),通航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在那时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而声名远播的就是闽南泉州刺桐港,领衔主演这台通洋大戏的就是闽南人。

明代海禁,闽南人以海盗、海匪、走私、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来抗争,九死一生走向海洋,终于逼得明王朝到晚期明白了“禁则海商变海匪,放则海匪变海商”。于是在闽南漳州九龙江口设海澄县,开放月港,遂使月港成了“天子南库”。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集团,被海外研究者称为“经济全球化,东亚第一人”。从 1632 年到 1646 年,他夺取了远东海上霸权,连荷兰人也只好向他纳税买海上通商权。清代又海禁,闽南人于是“过台湾、下南洋”,把闽南文化、中华文化远播他乡,直至今日依然深刻地影响台湾和东南亚。

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闽南人是中华民族始终不渝从黄土走向海洋的先驱;闽南文化,

不仅是厦漳泉地域文化,不仅是所有闽南人的民系文化,更是中华文化从黄土走向海洋的经验积淀和智慧结晶。

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突显了它的当代性和世界性,我们应当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以更加多样的视角重新认识、重新定位闽南文化。闽南文化研究也应当在更加宏观和多维的空间来建构闽南学学科体系。同时,从更多关注闽南文化的历史,转向更加关注闽南文化的当代性和世界性发展。

(作者系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 王日根:谈谈闽南海洋文化建设思路

###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据杨国桢先生研究:“海洋国家”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是西方海洋强国主动寻求和维系其海上强权的表述。但它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认识路径和历史背景,从最初强调海外殖民、远洋贸易、军事海权,发展为将“海洋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西方“民主”的象征符号。

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他总结了英国的成功经验和其他国家的教训,指出近代西方国家兴衰与海洋权力之间的密切关联,宣称“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的著作迅速风靡全球,引发世界范围的海军扩张浪潮。

麦金德通过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组合,他建构出民主“海洋国家”对抗专制“大陆国家”的历史图景。

在他们的指称中,“海洋国家”彻底符号化,成为西方阵营的自我代称,而“大陆国家”成为苏联及其同盟的代名词。这些话语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成为当地思想界、学术界的标准话语,日益“经典化”,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误导。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国家”这样的象征资源通过话语传播产生了维系西方中心地位的作用。

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西方的殖民扩张基本同步,欧洲世界体系的扩散和民族国家体系主导国际秩序的确立也是相辅相成的。黑格尔对其民族国家经典原型“精神”中海洋性的突出强调,将“海洋国家”的对象和概念从客观世界扩展到主观抽象世界,为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文化霸权论述奠定了基础。

有鉴于此,我们绝不能在“海洋文化”概念上一味地跟着西方走,而是应该更加突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中国海洋文化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辉煌,有若干值得当今世界借鉴的内容,特别是“和而不同”、和谐的海洋文化观。

### 二、闽南海洋文化的创造者

我们应改变过去将官民对立化的思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包含“官民相得”的优良传统,包括官方军事力量、行政力量、地方士绅、家族组织、普通民众乃至海盗、海贼,都参与了闽南海洋文化的创造,探究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追究历代闽南海疆开发的程度及其局限性,通过对历代海疆政策演变与海疆开发历程的考察,探明历代国家的海洋观、面对海洋形势变迁所做的反应及其效果,重新审视学界较流行的清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偏颇观点,凸显历代闽南海疆开发中民间力量先于官方政策、官方政策跟随民间行为的特征。明代海盗实际上是海商谋求通商贸易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嘉靖倭乱中确有部分是谋求正当贸易的,遭遇到打击倭寇扩大化的



劫难。

### 三、闽南海洋文化的外植与外来文化对闽南海洋文化的内侵

闽南海洋活动势力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北中国海、南中国海直至海外各国,有时还扩及中国内地,形成巨大的妈祖文化圈。反之,西方文化往往通过华侨华人影响到祖籍地来,因此,闽南海洋文化不仅仅是自产的、封闭的,而且不断接受外力的影响,处于与时俱进的状态中。

### 四、闽南涉海史籍缺乏系统整理

我们应该对传世文献、田野文献做尽量全面的搜集与整理,目前,许多地方都在搜集、整理海外汉籍资料,譬如何乔远《镜山全集》、曹学佺《石仓全集》等都仅保存于日本。

陈自强先生列举出若干这样的史籍:如吴朴《渡海方程》和《龙飞纪略》、《顺风相送》、俞大猷《正气堂全集》、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邓钟《筹海图编》、沈有容《闽海赠言》、李光缙《景璧集》、何乔远《闽书》和《名山藏》、杨一葵《裔乘》、张燮《东西洋考》、潘鼎珪《安南纪游》、《指南正法》、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蓝鼎元的有关著述、程日祜《噶喇吧纪略》《噶喇吧纪略拾遗》、陈洪照《吧游纪略》、林君升《舟师绳墨》、王大海《海岛逸志》、黄可垂《吕宋纪略》、《崇武所城记》、崇祯《海澄县志》和乾隆《海澄县志》、乾隆《鹭江志》、乾隆《马巷厅志》、道光《晋江县志》、道光《厦门志》、清代漳州道教科仪书《送彩科仪》、《安船酌献科》。其实我们还可以将闽南地区的地方官员的文集、闽南籍在外地任职的官员的文集中有关海洋方面的论述与记录加以搜集,仅漳浦就有像陈元光、吴与、朱天球、潘存实、高登、黄道周、蔡世远、蔡新等历史人物,南靖有庄亨阳等。搜集整理海洋贸易的盛况描述、中外关系描述、重商意识与商业观、海疆意识、海防意识、水师军事思想、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海洋人文性格与社会习俗等资料,以挖掘其中海洋文化及观念。

### 五、应揭示海洋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差异

如今,海洋文化似乎成为了“阳春白雪”,其中在中国历史的很长历史时段,它处于“下里巴人”的地位,正像改革开放前泉州的经济不如漳州,而改革开放后泉州的经济迅速超过漳州一样,我们不宜只站在当下误判历史。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 谢国兴: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的辩证性关系

台湾是闽南人向海外移民地区中人口最多的聚居地,在台湾,闽南语习惯上被称为“台湾话”(这种说法已有百年以上),至少从日本侵占台湾开始,“台湾话”乃是相对于客家话、日本话、北京官话而言,是台湾地区占人口八成以上的漳、泉(包括潮、汕)移民使用的语言。语言与族群、文化认同最是密切,有了“台湾话”的指称,自然也就有了“台湾人”、“台湾文化”的对应认同出现。日本的殖民统治无疑是强化台湾人自称“台湾文化”而不称“闽南文化”的重要因素;相对于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台湾人与台湾文化是广义的用法,包含了福建、粤东移民在台湾定居、生活所形成的族群与文化;但在台湾内部,闽南族群人多势众,抢占了台湾人的代表性(或称为闽南沙文主义),于是有了客家人(闽西、粤东、闽南皆有操客语族群)与台湾人的相对说法。总之,台湾文化与闽南文化有相当大的重叠部分,但又不完全相同,不仅是台湾文化包含了客家、潮汕文化的部分,1949年以后,在融合了闽南、客家、日本及外省人移入的影响之后,呈现的是十分多元、与闽南文化不尽相同的“本土文化”,因此研究台湾的闽南文化应该注意其与漳泉原乡闽南文化的差异性。

但台湾文化的根源毕竟主要仍来自闽南地区,因此闽南文化的探究仍然是理解台湾文化

不可或缺的元素,台湾文化中的潮汕、客家元素,其实在研究闽南地区文化时,也同样不容忽视。闽南、闽西、粤东(潮汕)地理相接,人群互动频繁,研究闽南文化原本就不能忽略漳泉与潮汕、闽西的交互影响,到了台湾,不同地域人群的互动产生的多元文化消融与增生,更是值得注意。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台湾开发早期,潮汕地区不少粤籍人士移民台湾,其中讲闽南语系的潮州人因所操潮州话与漳州话接近,基于现实的利益(如置产、参加科考等考虑),遂隐藏粤籍身份,与漳州人混同,日据时期调查居民原籍时,许多讲潮州话的移民就变成福建籍,讲客家话的才登记为粤籍。当我们研究台湾的闽南文化时,绝不能自限于漳、泉范围,而忽略了潮州文化的因素与影响。又如,三山国王信仰源自揭西,然潮州人崇拜三山国王也相当普遍,事实上揭西河婆三山国王祖庙的历史发展,显示该信仰即使在河婆地区也并非客家人的专属信仰;台湾漳化平原的三山国王庙数量众多,然该地讲客家话的人群甚少,过去或以为彰化平原是福佬化的客家人所垦殖(称福佬客),这样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恐怕仍有待深入探讨。盖因其中讲潮州话族群可能被简化为“粤籍”,再由“粤籍”简化为祖先是客家人。同样类似的错误印象是,台湾的三山国王信仰被简化为客家人的代表性信仰,于是平原地区的许多三山国王庙被误认为曾是客家族群的拓垦地,而忽略了三山国王与潮汕闽南语族群的重要关系。

总之,闽南文化无论在福建或海外,其特性早以超越漳泉地域特性,这一点实不容忽视。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江柏炜:闽南文化研究所在金门

2006年8月,金门大学(前身为金门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金大)成立以硕士班为主的闽南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闽南所)。这是台湾各大专院校唯一以闽南文化做为教学、研究主题的研究单位。经过几年师生的努力,闽南所已经成为金大的特色系所,在海内外学术界初步具有知名度。

作为创所所长,以及长期负责所务工作的人来说,闽南所发展的首要工作是强化学科建设。一个新兴的人文社会学术领域,不但要有整合性与开放性,避免画地自限的学科定义,也要考虑资源的有限性及短期内建立学术优势的迫切性。在这样的思维下,我们和同仁们在多次的讨论中,拟订了“多学科、跨地域、全球视野、在地关怀”的发展目标。

多学科对话,是人文社会学科的趋势。惟有如此,才能提供学术发展的养分。在极为有限的师资员额中,我们择定了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等专业,进而聘用学有专精的老师进入本所。另配合金大的华语文学系之汉语方言、民间文学等师资,初步建构了闽南所的阵容。未来,若有进一步扩充的机会,仍需聘用戏曲、考古学、博物馆学等专业教师。

跨地域是尝试以金门为核心,进行与闽南其他地方社会、台湾,以及东南亚及东北亚华人社会的比较研究。事实上,金门作为历史上的侨乡,海外移民遍及各地。在过去数年,我们探讨海外金门社群的文化变迁,以及他们与侨乡之间的关系,累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将闽南视为一个文化词汇(cultural term)而非仅仅是地理词汇,有助于我们扩展教学研究视野,并让闽南文化研究成为国际关注的重要学科。

全球视野与在地关怀是我们思考课程架构的核心精神。历史上,闽南文化的跨境传播,以及在不同国家与社会下的当代变迁,是我们理解华人文化强韧生命力的例证。因此,通过世界史的视野,重新理解闽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与其他文化相互对话,更有助于深入了解闽南文化的特性。在地关怀的部分,则是我们对于金门岛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的社会实践。过去

一段时间,闽南所的师生参与了金门的历史保存工作,也举办了多届“闽南文化国际研讨会”与“金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累积了古迹修复技术、遗产空间活化利用、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知识与技术,不但壮大学科发展,也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能力大有帮助。

闽南师范大学首创的“闽南文化国际笔谈会”,以一种工作坊的形式,让不同专长的学者,聚焦于闽南文化学科的界定、内涵、现况发展与未来展望,提供了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实为闽南文化研究发展上的重要里程碑。金大闽南所的发展经验尚浅,有待进一步向素有声望的学术先进学习,期能未来跻身海内外一流学术单位之林。

(作者系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现任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

## 陈益源:呼吁重视东南亚福建义山的调查与研究

近几年来,台湾成功大学推动海峡两岸暨世界闽南文化研究,不遗余力,目前本人在成大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持“闽南研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整合型计划,并在财团法人蒋经国国际交流学术基金会补助下执行“东南亚闽南庙宇及贸易网络:越南与马六甲海峡闽南族群之比较研究”的国际合作课题,此外,还有一项名为“东南亚福建义山的调查与研究”计划,有意结合各国力量,为福建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文化做出更完整的描绘。

以往,马来西亚马六甲三保山墓园、日本长崎福济寺福建墓园,都曾受到关注,研究所得亦有助于重建福建移民史实。然而,整体看来,东南亚各国的福建义山仍未得到比较完整的调查,因此许多福建移民的辛酸血泪迄今仍湮没在荒烟蔓草间。例如香港福建义山、越南太平省华人墓园、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福建义山等等,都仍有待深入调查。

“东南亚福建义山的调查与研究”计划的执行,无论是针对各国福建义山地理分布的调查,义山古坟年代的考证,墓主家族来历的考察,义山管理与殡葬习俗的探究,或者同一墓园不同地区移民的组成统计,不同墓园而有同一宗族的比较分析……,乃至跨国移民网络的追踪与系联,这些研究对于早期福建人漂洋过海参与各国建设的历史,将有还原真相的具体功效。

最近在我召开的一次以“东南亚福建义山的调查与研究”为主题的闽南文化工作坊中,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林德顺博士首先报告了他们执行“安息处、知识库、争议场:马来西亚华人义山研究”计划的内容,以及吉隆坡福建义山调研的最新情况,该校研究团队现已完成一部分的拓碑、统计与文献搜集,同时也遇到一些困难,例如文物保存缺乏专家的协助、义山在都市规划下面临迫迁等问题。马来亚大学吉隆坡福建义山的调查研究,同时也是成功大学“台湾与东南亚暨南亚大学校长论坛”(SATU)所支持的“东南亚福建义山的调查与研究”跨校合作课题之一。

其次,同样来自马来西亚而在台湾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白伟权先生,则报告了马来西亚新山绵裕亭华人义山调查结果。白伟权博士透过墓碑的抄录、拍照与定位,归纳出新山不同时期的人口组成与分布,此外研究墓碑的字样,除了能够画出不同族群的分界,也标记族群认同与地方认同的意义。

出席这次工作坊的屏东教育大学黄文车副教授,则负责报告新加坡武吉布朗山墓葬状况。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受道路建设工程影响,估计有5000个坟墓被挖掘;为保留咖啡山的文化遗产,许多民间学者与团体投入记录与抢救工作。黄文车教授表示在新加坡看到的福建义山墓碑与商业、会馆的关系密切,大多可以在碑文看见商号。这些商号标记亦见于金门、马来西亚、越南华人义山坟碑,进一步调查,可突破地域范围,追溯华人各国祖籍地联系与跨国网络

的建构。

来自越南会安管理保存文化遗产中心的阮志忠主任表示,越南在都市化之下,很多墓地也遇到迫迁危机,甚至有消失的可能。他说会安在15世纪到17世纪是重要的国际海港城市,17世纪时即有6000多名华人在会安地区生活,主要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现在仍保存很多17世纪福建移民的义山坟墓。越南会安管理保存文化遗产中心目前掌握了包含福建义山墓碑、地契、家谱在内的等各式文献6000多页,已与成大人社中心达成双方合作出版的协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把这些古代的闽南文献公诸于世,因为这些材料也是建构会安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越南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

以上我简单报告“东南亚福建义山的调查与研究”计划的内容与进度,在此诚挚地呼吁东南亚各国的学者专家,从关心当地的福建义山开始,认真做好当地的调研工作,并且放大眼光,与我们中国福建原乡和周边国家的福建义山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台湾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已搭建起“东南亚福建义山的调查与研究”合作平台,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经验与资源,期盼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响应,共同为各国福建义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世界闽南文化的研究奉献心力。

(作者系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副主任)

## 柯木林: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节略)

闽南文化是海外华人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东南亚一带,闽南文化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新加坡由于地处“南洋之要冲”,有“南洋第一埠头”的美誉,是西方各国商贸船只通往中国的总汇,因此,历史上新加坡也成了“闽广客民流寓之地”。

闽南文化研究应该另辟视野,换个角度,从海外华人视角看问题。作为长期研究新加坡华人历史的学者,兹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对闽南文化的研究方法、挑战与问题,提出个人见解,与诸位学者讨论。

### 一、新加坡的福建省移民

早期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省。而南来新加坡的福建省移民,则多数来自漳州、泉州、永春、南安、同安、福州、福清、兴化等地。由于漳泉人士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在新加坡,福建人指的是讲厦门话的漳泉人士。只有漳泉话才是福建话,只有漳泉人才称福建人,后移民至此的如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贯人士,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

职是之故,祖籍同属福建省的陈嘉庚(Tan Kah Kee, 1874~1961)与胡文虎(Aw Boon Haw, 1882~1954)就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方言的族群:闽帮与客帮。胡文虎可以担任香港福建同乡会的永远名誉会长,但在新加坡,他只能是客帮领袖,而陈嘉庚则是名副其实的福建帮首领。

追本溯源,薛佛记(Si Hoo Keh, 1793~1847)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这位祖籍福建省漳浦县东山上营(今石榴东山村上营)的福建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海峡华人),生死都在马六甲。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他的矿区在宁宜河(Linggi River)流域一带。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在新加坡发迹后,薛佛记开始关心旅居新加坡的漳泉侨民的问题。于是创办恒山亭,捐建天福宫,晚年又回到马六甲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

福宫落成,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介于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看,薛佛记已退居二线,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陈笃生(Tan Tock Seng, 1798~1850),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从1850年代开始至1906年代,陈笃生祖孙三代领导新加坡福建帮近60年。1906年天福宫重修时,主其事者大董事陈武烈(Tan Boo Liat, 1874~1934)乃陈笃生曾孙。

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马六甲华人社会(简称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青云亭于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1824~1839)是薛佛记三妹薛世娘的丈夫。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不愧为19世纪新马两地的豪门。直至192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See Tiong Wah, 1886~1940),就是薛佛记的后人。

上述史实,说明了早年的新华社会与呷华社会一衣带水,也说明了早年新华领袖与呷华领导层有着紧密的联系,两地往往拥有共同一批侨领。

作为结束19世纪的号角,1900年8月1日一个不寻常的团体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应运而生。他们提出“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的口号,掀起参政的浪潮,高举改组立法院的旗帜,企图全面投向殖民地主子,对中国起了离心作用。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当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攻打义和团。吊诡的是,虽然多数峇峇以英国为效忠对象,但本身仍以作为“永春峇峇”为荣。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Peranakan),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男的叫峇峇(Baba),女的叫娘惹(Nyonya)。政治上,他们效忠英国,以英国为其“祖家”,正如中国移民视中国为祖国一样。

新加坡的“峇峇”多数是从马六甲来的华人。在这块新开辟的土地上,他们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与英人通商交往,个个风云际会,春风得意马蹄捷,对早期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

因此,研究早期新加坡华人史,离不开恒山亭、青云亭与“峇峇”这一族群。早年华人庙宇中的碑文、匾额乃至墓志铭、族谱,多有峇峇语言,其间夹杂不少英文、马来语及闽南方言,颇具南洋色彩。“峇峇文化”是闽南文化在海外伸延的另一章,值得重视。

## 二、问题与困惑

新加坡华人历史虽然不如中国历史那样波澜壮阔,把它分作几个阶段来研究,并不是不可以。不过,如果要研究象新华社会这样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人物为切入点,研究这些人物的历史及其接触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新华社会的历史轮廓。这是一项从点到面的研究方法,值得提倡。

然而,有那些课题值得研究?如何开展这些课题的研究呢?这是长期困扰学者的问题。如果从比较广泛的立场来看,则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可以注重以下四方面:

### (一) 社会组织

在东南亚一带,尤其是新马,“帮”的表现最为突出,这是由于说不同方言所造成的隔阂而形成的,也是华人社会结构中的特征。早年的新华社会往往有帮权政治的存在,如闽帮、潮帮、

粤帮或漳泉集团、永春集团等。我们可以通过庙宇、会馆这些组织,从横的方面了解当日华人社会的情况。

## (二)社会生活

这是要观察在同一社会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情况。从最基本的家庭制度开始,扩大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俗民情、行业文化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是可以研究的课题。

## (三)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可说是社会关系的失调(maladjustment),其影响足以危害全体社会或一部分人的福利与生活安全。如早年华人社会中的偏见或各帮派族群间的斗争,会党组织、猪仔娼妓的苦难、械斗与战争的干扰等等,都是新华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 (四)社会政策

社会问题产生了,就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予以对付或改善,这就须要一套完整良善的社会政策。因此,社会政策可说是用以治疗社会问题的良方。如英殖民地政府政策、社团注册法令等都是显著的社会政策的例子,必须重视。

在研究方法上,可采用“三重证据法”,即:文献资料、田野工作、口述历史。

## 三、结语

海外华人文化可以丰富闽南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保持闽南文化的完整性,就不能把闽南文化的研究孤立起来。闽南文化研究须要有海外华人史的底蕴,这是一项由外及里,由边陲看中心的研究。当然,我们所要做到的是从各方面广泛地收集史料。

历史研究从来不易。闽南文化加上海外华人文化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还是要坚持。谨以屈原《离骚》中的几句话,与诸位学者共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系新加坡宗乡总会学术主任)

## 曾 玲:跨境发展的“文化闽南”: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思考

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区域文化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区域文化史的研究,不仅涉及所在区域的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亦体现了五千年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形态与重要特征。

作为华南区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闽南文化,具有与内地地方文化一些不同的特征。伴随近现代以来闽南地区的海外移民,在祖籍原乡所形成的区域文化,也跨境传播到台湾、东南亚、日本、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并在当地社会的脉络下,逐渐形成具有在地特色的闽南文化。换言之,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地区,其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境内”与“境外”的多元形态之特点。因此,对闽南文化的研究,仅局限在中国“境内”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跨出“境外”,考察伴随闽南移民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具有在地特色的闽南文化。

近二十余年来,闽南文化史特别是福建台湾两地闽南文化研究有长足的进展。两岸高等学府、民间学术团体不断举办各种类型的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诸如《闽南历史文化概说》(闽南师范大学2013)、《闽台文化的多元诠释(一)(二)》(闽南师范大学2013)、《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成功大学2011)等一批具有相当学术份量的研究专著及论文集等。此种状况固然与当代两岸关系和缓、“海西概念”提出等现实人文大环境有关,但同时也显示当前闽南文化研究的新趋势,即向着突破“闽南”地域限制的方向拓展。

然而,闽南文化研究要真正“跨境”走出“闽南”,在地域上仅拓展到台湾是不够的,还必须包括大中华以外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会,特别是在祖籍闽南华人人最多、且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而在扩展研究地域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反思现有理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视野。

到目前为止,学界有关闽南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中国区域文化史”的脉络下展开。该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将“闽南”视为一个地理概念,考察在“闽南”这个区域内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在地理上指的是华南福建南部包括泉州、厦门、漳州所属的各县市。换言之,在“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框架下,现有的闽南文化研究是从中国的视角,以看得见的特定区域“闽南”作为考察该文化形态的地理与区域边界。上述的研究框架与考察方法显然不适应离开祖籍“闽南”这一地域范畴、并在当地社会脉络下发展的台湾、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闽南文化”。

首先,伴随闽南人的海外移民而跨境传播到“境外”的闽南文化,其“闽南”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以东南亚为例。当近现代以来包括同安、厦门、南安、安溪、晋江、漳州、诏安等在内的大量闽南地区移民离开原乡到南洋拓荒,在当地殖民统治的时空脉络下,“闽南”不仅特指来自同一祖籍闽南的移民社群,亦作为群体认同意识与维系社群的文化纽带,承担凝聚与整合该社群的重要功能。最可说明这一转变的案例是闽南方言。在移民时代的南洋华人社会,基于移民社群整合与华人社会建构的需求,原本在祖籍原乡仅具沟通功能的闽南方言,转化成为承载移民群体意识的“闽南方言群认同”。闽南方言在南洋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的新功能,显示跨境发展的“闽南文化”中的“闽南”,已经从祖籍地看得见的地理概念,转变成为看不见的具有特定群体内涵的文化符号。也就是说,原本作为中国华南区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闽南文化,当其离开祖籍原乡传播到移民时代的东南亚后,因殖民统治时空脉络的制约而转变成为该地区的闽南社群文化。

另一方面,当“闽南”成为海外闽南社群的文化符号而不再是一个祖籍原乡地理概念之时,“境外”闽南文化的发展即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并历经一个再建构的历史进程。还是以东南亚为例。众所周知,东南亚尤其是新马两地祖籍闽南的华人数众多,是海外华人中闽南人最为聚集之区。自移民时代以降,这一地区祖籍闽南的华人被称为“福建人”,该社群则被称为“福建帮”。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该社群人口众多、经济实力强大,以及在华人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该社群在东南亚从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历史变迁的时空脉络下,历经了一个运用传承自祖籍地的闽南文化资源,整合与建构了东南亚闽南社群结构和形态的历史进程。因此,从“闽南人”到“福建人”的转变,并不仅是一个社群名称的改变,客观上亦显示跨境的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发展出“福建文化”的新形态。而历经建构进程的东南亚的“福建文化”具有多元之特征。一方面,作为外来的文化形态,东南亚的“福建文化”传承自祖籍闽南,在文化内涵上亦与原乡的闽南文化同属一宗。另一方面,伴随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而形成的“福建文化”,其作为一种社群文化不仅与东南亚闽南社群的演化密切相连,亦因此而具有在地特色而成为东南亚华人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括以上所述,近现代以来,伴随闽南人的海外移民,闽南文化也跨越祖籍原乡的地理疆界而传播到台湾、东南亚、日本、欧洲、美国等世界各地,并在当地社会变迁的时空脉络下发展出“境外”之形态。“境外”的闽南文化,其“闽南”已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为一种具有特定社群的文化符号,而在原乡作为区域文化形态的闽南文化,也发展成为“境外”闽南人的社群文化。“境外”闽南社群文化具有多元特征。它与祖籍原乡的闽南文化同属一宗,同时又是所在国华人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笔者以东南亚为例对“闽南文化”跨境发展的讨论显示,作为具有“境内”与“境外”多元形态的闽南文化,以“区域文化史”作为研究框架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涵盖跨越祖籍原乡在“境外”发展的闽南文化。有鉴于此,笔者冒昧提出“文化闽南”的研究理念。所谓“文化闽南”,即从文化的“闽南”而非从区域的“闽南”出发研究闽南文化。在“文化闽南”的理论框架下,一方面,闽南文化研究可以跨越祖籍原乡的地理疆界,将考察的视角拓展到台湾、东南亚等不同的地域;另一方面,就文化内涵而言,“文化闽南”不仅涉及祖籍原乡的闽南文化,亦涵盖境外不同地区的闽南文化。最重要的是,透过“文化闽南”这一学术理念及其阐述,包括祖籍地在内的全球的闽南文化可以汇集在一起,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文化形态。世界性的闽南文化源自作为华南区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闽南文化,而各地区的闽南文化又因具有在地特色而成为所在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就现实意义而言,“文化闽南”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强化世界各地的闽南社群与祖籍原乡、以及各地的闽南社群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透过“文化闽南”这一文化纽带,亦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海外华人所在国的友好交往。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 林国平:闽南·闽南文化·闽南文化研究

“闽南”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闽南”一词出现频繁,但所指的区域范围因时、因人而异,大到福建省,中到福建南部,小到泉州、漳州府。虽然古文献中的“闽南”有不同的区域指向,但总的趋向是区域范围逐渐缩小和明晰,泉州府和漳州府为“闽南”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中根本原因在于厦、漳、泉使用共同的闽南方言。因此,我们在研究闽南文化时,要充分考虑作为文化载体的闽南方言在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闽南文化是指闽南人及其后裔共同创造的、以闽南方言为主要载体的、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以海洋文化为特色的文化共同体。闽南文化的发源地是闽南,中心区是闽南和台湾,亚中心区是福建其他地区及其周边省区的闽南人聚居地,散播区是东南亚及其世界各地的闽南人聚居地。

闽南文化历史悠久且富有活力,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影响巨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目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整合闽南文化研究的力量。近年来,闽南文化的研究几乎成为显学,不但参与研究的学者多,泉州、漳州、厦门、台湾、海外还相继成立闽南文化的研究机构,建议在此基础上,成立世界闽南文化研究会,以整合世界闽南文化研究的力量,更好地分工协作,共同攻关,促进闽南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

二是普查闽南文化的家底。要调动省内外、海内外的各种力量,对闽南文化的家底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普查,包括闽南文化分布范围、生存状态、闽南人族群、文献、方志、档案、碑铭、族谱、口述历史等等,建立世界闽南文化图书馆和世界闽南文化网站,为闽南文化的研究提供方便;

三是建构闽南文化理论体系。要组织专家学者对闽南文化的内涵、外延、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等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达成某些共识,为闽南文化研究提供深入讨论的平台和理论指导;

四是培养闽南文化研究人才。为了使闽南文化研究持续发展,人才培养是关键,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培养。既要依靠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养人才,还要利用民间力量培养人才。建议成立



世界闽南文化研究基金会, 募集研究资金, 资助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开展闽南文化的研究;

五是推动闽南文化走向世界。闽南文化虽然随着闽南移民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但认同闽南文化的族群比较单一, 绝大多数是闽南人及其后裔, 具有突出的局限性。所以, 要凝聚世界闽南人的智慧和力量, 制定并逐步推行闽南文化的发展战略, 不断丰富闽南文化的内涵, 提升闽南文化的普世价值, 使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逐渐为世界其他族群认同和接受, 真正具有世界性。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闽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林华东: 文化的涵义与闽南文化的特质

文化是伴随人类成长和发展的产物。它有别于“自然”, 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思维和能力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结果。也就是说, 文化是人类“化物”和“化人”的产物。语言是人类区别于低级动物的重要前提, 是人类意识的载体。人类正因为有了语言和意识, 才有了文化。著名文化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再论文明的冲突》中曾经说过, “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由此出发, 我们对文化就可以获得以下共识:

一、文化是人的意识行为, 是人借助于劳动人化客观对象的过程;

二、文化需要依靠语言来表达, 通过语言来记忆和传承;

三、语言是特定民族特定社会交流的工具, 语言承载的文化具有民族性; 方言作为民系族群社会交流的工具, 承载着这个族群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 因此, 族群文化的命名经常会与方言的命名相一致。

总结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文化是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 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 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以及由此出发改变客观世界的综合体现。

由于文化是人在生存过程中产生的, 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功能; 因此, 文化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是通行同一语言的社会群体、民系族群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给闽南文化做出如下定义:

闽南文化是以闽南方言为外在特征的世界各地闽南人, 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思维意识、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区域性文化。它属于地域文化, 因此, 它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 它又属于族群, 因此它跟随族群获得对外传播。

我们说,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并对中华文化做出延伸, 那是因为闽南文化有着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其一, 承载闽南文化的闽南方言保留了唐宋之前古代汉语的基本面貌, 被学术界成为古汉语的“活化石”, 是现代汉语其他六大方言(即,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所不能比拟的。所以, 要了解上古汉语, 可以从闽南方言找到基本答案; 要重现唐、宋诗人吟唱诗词的情景, 必须选择闽南方言。其二, 闽南的艺术和风俗, 源于古代北方文化。用古老的闽南方言演唱的闽南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 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闽南族群保留了北方带来的民俗习惯, 时刻记忆着自己的郡望祖籍。闽南的红砖建筑延承北方望族体例。其三, 闽南文化在福建得到了拓展, 例如, 悠久的造船历史达到同时代世界先进水平; 崇尚工商锻造了闽南人生存与发展新路; 发达的海外交通贸易, 使泉州刺桐港经历了 400 多年东方第一大港的繁荣; 海丝之路让欧洲人赏阅了中华文明的第一道风景! 早期欧洲人因为海上的经历, 曾经把福建闽南商人的语言当作中国话, 把闽南文

化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

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中华文化更加绚丽和更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时,也彰显了闽南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和互补性。研究和弘扬闽南文化,对我们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两岸民众的祖国认同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在《闽南文化的精神与基本内涵》(《光明日报·理论(史学)》2009年11月17日)中论述了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并将之概括为:重乡崇祖的思维观,爱拼敢赢的气质观,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山海交融的行为观。我在《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一书中,对传承于中华文化的闽南族群的典型思维意识又做了四个角度的提炼:

一、“原乡情结、祖先崇拜”——体现了闽南文化的族源意识;闽南人具有典型的传承祖先记忆和回报乡梓的文化自觉。

二、“和谐互惠、海纳百川”——体现了闽南文化的兼容意识;闽南人崇尚“你好我也好”的互惠共赢的商贸意愿。

三、“灵活机变、敢为人先”——体现了闽南文化的拓展意识;闽南人拥有山处海行、抢抓机遇的开放性眼光。

四、“坚韧务实、百折不挠”——体现了闽南文化的自强意识;闽南人推崇敢拼敢赢的进取精神。

闽南文化意蕴深远,我愿鼓而歌之:

飘四海不忘祖先桑梓,  
善工商推崇互惠共赢;  
抢机遇随时可山可海,  
敢拼搏见证坚韧豪情。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主任)

## 徐晓望:对闽南文化研究的看法

闽南文化的根是中原区域萌发的华夏文化,唐宋时期中原移民将中原文化(广义)传播到福建,在闽地与本土文化融合,并吸收了海外文化的有益成分,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闽南文化。从闽南文化的组成来看,它的民俗文化拥有较多的本土文化成分,而其雅文化拥有较多的汉文化的成分。闽南方言是中原汉语与越语的结合,它的根基是唐宋时期的中原古汉语,而其名词含有闽越语的成分。就思想领域而言:儒家的道统、佛教中的大乘文化都来自中原,闽南人也在文学、史学、经学等汉文化领域颇有创造,这说明闽南文化上层的雅文化是属于中原文化的。但是,来自中原与江淮一带的汉人进入福建后,逐步融入当地的农业体系,他们以稻米为主食,吸收了当地人的稻米文化和亲水文化,例如:制作糍粑之类的食品,划龙舟,吃粽子、干栏建筑,这都是南方文化传统。就他们的信仰领域而言,南北文化混杂最为突出:关帝、泰山神、城隍之类的信仰体现了北方传统,而妈祖、临水夫人、五帝崇拜、吴真人等内容体现了南方文化传统。观音等佛教神灵则是全国民众共同信仰的神明。儒家崇尚的八德:忠、孝、仁、信、礼、义、廉、耻等观念深入闽南的底层社会,成为闽南人的基本价值观。所以说,闽南文化的本质是中华文化。

闽南文化最早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地域文化,而后逐步发展为一个与海洋密切相关的族群文化。在环中国海区域,不论是东亚还是东南亚,到处都有闽南文化传播。在中华文化的各个分

支中,闽南文化在历史上是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它表现于:历史上从事海洋生涯的船长、水手、商人以闽南人最多,闽南文化吸收了最多的海外文化,同时,将中华海洋文化传播到海外各地。所以说,闽南人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海洋文化性格。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主要贡献,也在于海洋文化。闽南人擅长航海,自唐宋以来,就将中国的商品运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海岸,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闽南人也是中国最早移居海外的一个族群。他们早在宋元时期就散布于东南亚诸港,明清时期,东南亚各地主要港市都形成闽南人的社区。他们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传到当地,东南亚各地城市的兴起,都与闽南人有关。闽南人为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陈庆元:闽南八郡五十邑——“闽南”一词的历史内涵

泉州(含1914年建县的金门县)、漳州、厦门三市,因其地理位置在福建南部,称之为闽南,这是当下最流行、最普遍的“通识”,几乎没有疑义。但是现在的泉州市,清代之前称泉州府;清代,厦门属泉州府同安县;台湾建府之前,其行政区划属泉州府。现在的漳州市,清代之前称漳州府,明代的漳州府,其下属县还有龙岩县,现在是龙岩市的新罗区,也是“闽南”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来说去,闽南的概念仍然不离泉州、漳州。

其实,清代之前,“闽南”一词,和现代地理学和行政区划学的概念不大一样。“闽南”一词的历史内涵,闽南就是闽,也即福建。

《周礼注疏》:“闽隶百有二十人。注:闽,南蛮之别。音义:闽,亡巾反;又音文。”南方各民族总称“南蛮”,“南蛮之别”,南蛮之别种,也就是南方民族的其中一个种族的意思。“闽”之出现,最早就与“南”联系在一起。

北宋郭祥正元丰八年(1081)通判汀州,作《次韵元舆临汀书事三首》,其三云:“卧龙胜事堪图画,迥压闽南七八州。”同题其一云:“岚烟蒸湿同梅岭,地脉逶迤接赣城。”诗中的临汀,即汀州,与赣交界。卧龙山是汀州名山,其气势足压闽南七八州。七八州,其实就是八州,七言诗必须凑足七个字,故言七八州。气压闽南八州,即气厌全闽。元代刘将孙《宣武将军汀州路達噜噶齐·尔佳玉陇齐公墓志铭》:“汀在闽南边鄙一道,控扼重地。”汀在闽南边鄙,即汀州为福建边远州郡,是控制出入闽的重地。闽南,即福建。

明代杨士奇《送杨参政致仕归永嘉兼简宗豫杨大夫》:“闽南八郡五十邑,咏歌鼓舞连道途。”闽南不止是泉、漳两州,八州、八郡,即八闽;五十邑,即五十县。诗中的“闽南”,其地域包括今福建全境,福建的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县都是闽南的一部分。闽南,就是闽,就是福建。

明代徐爌辑有《闽南唐雅》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录皆闽中有唐一代之诗,自薛令之以下得四十人。”薛令之,福安人;四十个诗人中,既有泉州、漳州人,还有很多不是泉州、漳州人。闽南唐雅,即闽唐雅,福建唐雅。闽南,就是闽,也即福建。

清代杨浚辑有《闽南唐赋》,收录福唐(福清)王桀、莆田黄滔、莆田徐寅三位赋家之赋,这三位都不是泉州、漳州人。闽南唐赋,即闽唐赋,福建唐赋。闽南,就是闽,也即福建。

清代文献中,泉州、漳州是闽南,福州、莆仙也可称闽南,龙岩、崇安(武夷山)、建阳、建瓯、南平、光泽、古田以至澎湖等地都可称闽南。研究闽南文化,有必要审视“闽南”一词的历史内涵。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闽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郭志超：闽南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古代文集集中的“闽南”即“闽”，提醒我们注意地名的历史演变。的确，指现代闽南区域的“闽南”一名出现很迟。不过，至晚到明代，民间已用“下南”指漳泉两府地区。宁德金涵畚族乡一个钟姓的武术世家，其所记载的武术祖师在“下南泉州府白鹤山”，金涵钟姓畚族至迟在明代迁徙中经过“下南”。这里的“下南”即今闽南。“下南泉州府白鹤山”应是当时钟姓畚民采用泉州府白鹤山汉民的表述。“下南”在闽南民间文献至迟出现于明代（具体待查证）。方言是方言群形成的标志。方言群与民系是等同的，但族群与方言群、民系就不一样。族群是有本群认同和他群识异的群体，也就是至少两个有差异的文化群体接触后才会有认同和识异的生产。徐晓望先生认为作为族群的闽南人形成于宋代，尽管我认为太迟了，但对他对闽南人族群认同的求证是对路的。

历史研究采用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既有文化史研究也有文化形貌研究，文化史相当于文脉，文化形貌相当于文相。文化史研究，倾向于历史学研究；文化形貌研究，属于人文学科研究。从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史来看，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自然科学(science)之子，即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衍生到社会研究领域的产物。人文学科(humanity)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解释(explain)，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理解(understand)。科学的解释有正误，人文的理解则为相对合理。当然，综合社会科学方法和人文学科方法的文化研究，是常见的。弘扬不是文化研究的本质而是功能。历史研究也有弘扬的功能。通过对祖国历史的揭示，可以激发人们的历史自豪感，也是弘扬。在研究方法之所以会发生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混淆，误译有很大责任。将humanity译为人文科学，遗谬深广。

以文化人类学而观，其文化研究的主流(社区调研为基石)属社会科学，但也有属人文学科的支流。这一支流的文化研究对象，主要是象征与阐释。精神表象就是象征，仪式尤为典型的象征。当文化物质形态蕴有意义，也成为象征。阐释象征的意义，不宜只是研究者主观赋予，而应理解“主位”(使用象征的人群)的意义，进而通过分析得出研究者自己的理解(客位)。主位的理解虽属主观范畴，但对于研究者却是客观事实。只取象征而忽略主位理解，有点像得椟忘珠，至少只是获取不完整的事实。如果不能获得主位的理解，那么就要研究象征的社会历史语境，并且获取有关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些资料及其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象征阐释。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郑 镛：闽南文化研究的思考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闽南文化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在元理论研究方面却没有大的突破，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的重点不明确，研究内容庞杂散乱。应进行必要的回顾与反思。

过去常讲闽南隋唐之后是为移民社会，主要传承中原文化，事实上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果说文化可分为雅文化(士大夫文化)和俗文化(民间文化)两个层面的话，从西晋末开始随北方移民传入闽南的雅文化，其主流当为中原文化(或称河洛文化)，中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传承较为稳定；而民间文化则不然，自西晋末以来，北方移民辐辏至闽南，为多区域、多时段进行，其带来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有较大的流变性。如吾“郑氏家谱”载，南宋末自莆迁漳之芑江(今龙文区郭坑之洛滨)。吾母系许姓则是清末自浙迁闽，先驻惠安，后至漳州任武职。各地俗文

化汇于闽南,融合化生而成俗,其中有越文化、楚文化、吴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元素,中原文化反倒是彰而不显。

为何说彰而不显,彰是一种集体历史记忆,一种官方的倡导,不显则是自唐宋时期逐渐形成的闽南族群对中央政权的有意无意疏离之表现。

闽南地处海隅,中央王朝威令难至,隋唐时就有“蛮獠”啸乱,五代末割据自雄,两宋豪强竞起,元代“连五十余寨”不肯屈服,抗争不断。明初起,违禁下海通番,至明末清初秘密会党蜂起……。闽南族群的人文性格相当独特,方言称为“彘獠”、“怪哥”,这一特征渐成朝野共识,以至于明清朝廷多次下谕告诫“漳泉刁民、强悍难驯”。明万历年间金门人蔡献臣评议“漳人好胜而逐利,杯酒责望,白刃相仇”。因此,研究闽南文化当重点研究闽南人的社会心理,研究闽南文化内部的差异性,研究的重心当是俗文化。应从闽南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入手,探析其社会文化心理形成、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影响,这样方能分辨出闽南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弘扬光大其优秀部分,在时代洪流中勇立潮头,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作者系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 何 池:闽南文化的形成及基本内涵的探讨

闽南文化是随着历史上的中原人士多次移民入闽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的。中原人士从晋至唐末的三次大规模移民入闽带来了中原文化,即西晋“永嘉之乱”中原移民入闽促使闽南文化开始萌芽,唐初陈政、魏箴率领的二批中原移民促使闽南文化初步形成,唐末“三王”入闽对闽南文化的形成起进一步推动作用。而南宋朝廷偏安南方使中原人士再次大量入闽,促使闽南文化的成熟。

从上述过程可见,闽南文化萌芽于西晋,形成于隋唐,成熟于宋元,发展于明清,弘扬并继续发展于当今。

闽南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十分丰富,以至于至今许多学者对什么是闽南文化,闽南文化的内涵等问题仍没有统一的定论(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综合诸多学者的合理元素,认为:闽南文化是所有闽南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就其外延来说,闽南地域是闽南文化的载体和发祥地,它随着明清时期闽南人向省外、台湾和海外的迁徙而传播到广东等地,传播到台湾,成为今天台湾的主流文化,传播到海外各国闽南人聚居之地。就其内涵来说,闽南文化离不开闽南的人、事、物。“人”即闽南人物,主要是历史人物,包括侨居海外的闽南人物;“事”即发生于闽南人当中的事,包括历史事件、历史故事以及语言、著述、艺术、制度、组织、民风民俗、思想思维、人文性格、宗教信仰、民间故事等等。“事”又可分为实事、虚事(即精神方面的事);“物”即闽南实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造物等。它包括了产生于闽南人中、闽南地域上的一切,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这一观点供大会参考。

(作者系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 庄小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融互动

闽南文化的研究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事实上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话题,在闽南文

化各类研究中均有所涉及。如闽南的宗教文化研究中,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渗透,即有上层儒学、正统佛教等向精英文化如何向下传播,而大众的民间信仰方式又如何向上使正统宗教调整接受的一个过程;又如在闽南的家族文化研究中,家族中的精英分子如何制定相关家规族规、家族仪式等供族内大众遵守,而族内大众在遵循过程中的传统与反传统等,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博弈;又如在闽南的戏曲文化研究中,戏本常常是由知识分子根据民众流传的故事进行创作,而在流传过程中又加入了大众的创造,这本身就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融合问题,戏曲文化虽雅俗共赏,但不同阶层对戏曲的不同需求,亦可反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特质,戏曲原为大众文化,而在今日社会似乎又回到高雅文士的层面,这一些,都有长时段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转换等话题;又如在闽南民间工艺的研究中,虽然众多作品出自工匠之手,但其中也留下了一个朝代或时代的文化取向,而这种取向,往往是来自于上层精英分子的影响,而成长于民间的工艺大师本身,也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结合的气质等。

在闽南文化中,这两种文化交融并存,不分彼此。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其实我们的研究还常常是沿用传统的二分法,即无意地将这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即使有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关于这两者之间的交流、互动等的研究依然较为缺失,这种互动研究的缺失,于精英文化的研究而言,会将精英文化禁锢在固有的框架上,看不到地方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影响,容易使精英文化的研究脱离具有地方特质的文化特点,于地方大众文化的研究而言,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解,即大众文化纯粹产生于民间、产生下级阶层,缺少深厚的文化内涵,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等同于粗俗文化。以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而言,如何把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研究的范畴,如何探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互动等问题至关重要,决定着区域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以研究闽南地区宗教及日常各种仪式来讲,如果能注意到精英文化在各类仪式中的参与度,注意到精英文化对仪式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精英阶层,如地方的官员、文士等与大众之间在仪式形成过程中如何平衡的问题等,那么对于向来被誉为汇集民间文化,包括民间舞蹈、音乐,乃至承载民众价值体系的闽南各类宗教、祭祀等仪式,也就更具深化研究的力度,由其我们便不仅仅旨在了解仪式的表象,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由仪式漫长的形成过程投射出闽南地区社会的变迁及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

(作者系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馆员)

[责任编辑 钟建华]